许昌日报
2023年8月30日 星期三

寻禹·探源

（扫码观看视频）

（扫码观看图文）

（第20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龙形陶器　　在禹会村遗址发现的柱坑

寻禹·探源报道顾问团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俊杰　具茨山上古文明发现者
教之忠　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
何俊杰　浙江省绍兴市文史馆副馆长
王吉怀　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和王城岗工作队原队长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瓦店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赵春青　新砦工作队队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刘海旺

禹会涂山篇（上）

禹会诸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报记者　邓雷　杨红卫　刘俊民/文　吕超峰/图

禹会村，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淮河东岸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从汉代起，这个村名沿用至今。

据《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曾在这里会各方诸侯，他们带着玉、帛前来拜会，接受大禹的号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史书文献的记载是否真实？禹会村的村名能否验证传说？“禹会诸侯”事件是否真实存在？

2013年12月，在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上，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先秦史学会、北京大学等60多位专家深入考古论证，确认蚌埠市禹会村是“禹会诸侯”之地。

不同寻常的小村庄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禹会村，北靠涂山、西邻淮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更因其村名中的“禹会”二字，格外引人关注。

有籍可查，这个村庄如今的村民都为明代洪武年间的移民后代，但古老的村名承载了更为悠长的历史印记。

春秋末年，鲁国权臣季康子执政，欲攻伐邾国，宴请朝中大夫，有大夫回忆古时“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相伐兼并至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左传·哀公七年》）。

晋代《太康地志》记载：“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娶也，山西南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

史书记载“点名道姓”，让禹会村“大名远扬”。

禹会村得名于大禹涂山之会，古史传说与地貌景观天然契合。涂山（海拔338米）与荆山（海拔258米）夹淮河而立，都是基性花岗岩山体，原为连在一起的同一座山。传说大禹治水时将其凿开，疏通水道，淮河因此独流贯通，消除了水患，形成了如今荆山和涂山对峙于淮河两岸的地理景观。

世代生活在禹会村的村民，在田地干活儿，经常捡到大量陶片，只是将其随手扔在一边，并没人研究这些陶片的由来。20世纪80年代，蚌埠市进行文物普查时，通过对村民捡到的陶片定性分析，发现这里是一座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但遗址有多大、埋藏着什么遗迹，当时并说不清楚。

2006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禹会村遗址正式迎来了实地勘测与钻探工作。2007年至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发现一处面积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式建筑（祭祀台基）；2015年、2017年，考古队又分别进行了规模更大的考古勘探，确认了龙山文化城垣的存在。

历次考古发掘带来的“丰硕”成果，让禹会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在全国“惊艳”亮相：禹会村遗址验证了史书上记载的历史事件有迹可查，民间传说的大禹故事并非无源之水，让大禹从“神位”走向了人间。

禹会涂山的“证据链”

8月23日，在蚌埠市博物馆三楼禹会村遗址展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王吉怀向记者一行介绍了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过程，对出土器物进行了详细解读。

为何认定“禹会诸侯”的地点就在蚌埠禹会村？作为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的关键人物，王吉怀给出了专业回答。

其一，禹会村龙山文化时代与大禹时代相吻合。经过对出土陶片进行测年，得出这些陶片距今4100年左右，这个时代正是原始社会末期，也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晚期，与大禹治水的时期完全吻合。

其二，礼仪性遗迹与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事件相吻合。目前出土遗迹主要有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大型祭祀沟、简易式建筑和不同类型的祭祀坑。比如，建筑基址，从下面往上依次灰土层、黄土层、白土层面，类似的工程需要有严谨的规划组织才能完成；基址上有35个长达50米的柱坑，可能是竖立万国番旗或各地部落图腾柱的地方，符合大会诸侯的场景；简易式建筑，极有可能是前来参加盟会的各地诸侯及族人临时居住生活的地方。

其三，出土的器物组合、文化特征与“禹会诸侯”事件相吻合。出土的大量陶器表现了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苏北平原龙山文化等，说明当时参加盟会的诸侯来自华夏大地的不同地区。

其四，自然科学的测试和论证与“禹会诸侯”事件相吻合。经过碳测，禹会村遗址属于41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晚期，当时环境气候剧烈变化，丰富的降水导致洪水泛滥成灾，与大禹治水的时代环境相吻合。

“时代的吻合、地域的吻合、文献记载的吻合、遗迹现象和遗物特征的吻合、自然科学的测试和论证，都为我们考证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有力证据。禹会诸侯事件的发生，证实了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禹会村遗址成为揭开淮河中游地区文明化进展的一把钥匙。”王吉怀向记者表示。

为何选择蚌埠涂山

大禹走遍大江南北，为何把“会诸侯”的地点选在蚌埠地区的涂山？

考古专家结合史书文献的记载，经过缜密的推断，认为有以下几大背景。

背景一：淮河中游是治淮工程的主要区域。大禹走遍了华夏大地，文献中记载的“疏九河”“道九山”“导九川”“陂九泽”“定九州”等事件都没有固定与蚌埠涂山的关联。但从水患的严重程度和治理水患的难度而言，淮河中游是最难治理的地段，主要原因是淮河中游的荆、涂二山所形成的峡口，成为淮水堵塞的主要障碍，每遇洪水泛滥，水流不畅而造成灾难。因此，大禹在这里实施并完成了惊天动地的治水工程“劈山导淮”。

背景二：与涂山氏国的渊源。蚌埠涂山是古涂山氏国的所在地，后涂山氏国与淮夷氏族融合，使得其成为当时最强大的部落团体。在大禹治水期间，尤其是治理淮河中游的水患时，得到了涂山氏国的鼎力相助。所以，最终大禹治水的成功，离不开涂山氏国的功劳，大禹有理由把蚌埠涂山作为这次活动的首选地。

背景三：对涂山氏国的报答。由于大禹与涂山氏国的联姻，进一步加强了在政治、军事上的联盟，蚌埠涂山不仅成了大禹与涂山娇的成婚之地，也成为大禹的第二故乡。加上涂山氏对大禹治水的贡献，选在这里盟会，也是弥补对妻族的亏欠和对淮夷部落的回报。大禹选在这里会诸侯，定会得到涂山氏国的全力支持。

背景四：承办大会的能力。大禹晚年的这次盟会，规模、档次非同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要具有一定的接待能力。前来朝会的各部落团体，既然有“万国”，其吃、住等方面的接待则是最重要的内容。涂山氏国的所在地，当淮河水患治理了以后，这里的民众归心、政治稳定、势力强大，经济相对富足，最具有条件承办这样的盛会。

基于当时治水的客观需要，以及联合强势氏族、壮大自身势力的考量，大禹最终将“会诸侯”的地点定在蚌埠地区的涂山，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禹会村遗址意义何在

禹会村遗址的辉煌考古成果，吸引了中国考古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通过考古发掘禹会之地就在眼前，成为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大禹伟业世代流传，考古工作者的功劳亦应永载史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题字说：“禹会涂山，史存疑团。科学发掘，一锤定音。”

“禹会村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了大禹的历史地位，证实了大禹确有其人，治水确有其事，会诸侯有据可寻；二是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可靠，验证了民间传说并非无源之水；三是获得了由传说变信史的科学依据，禹会村遗址的发掘给了一锤定音的结论；四是确立了‘禹会诸侯’在涂山的空间坐标，最终使蚌埠的涂山成就了‘禹会诸侯’的共识之地。”王吉怀这样评价。

8月23日，蚌埠市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副主任寇魏带领记者，实地观摩遗址发掘保护现场，介绍了建筑基址、大型祭祀沟、简易式工棚等考古成果。他说，为更好地开展考古发掘和文化资源保护，规划总面积6785.25亩的蚌埠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20年5月动工建设，目前已完成“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保护修缮项目、公园北部村庄建筑立面改造项目、考古工作站暨标本整理基地主体建筑、考古学家的院子、环境整治一期”等规划项目建设。

“禹会村遗址公园下一步将努力打造集考古科研、文化传承、主题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汇吃、住、游、学、娱、购等诸多元素为一身的现代化大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公共空间，向更多青少年普及考古知识，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寇魏表示。

王吉怀

禹会村遗址发掘现场

夏文化新探索

陶寺遗址朱书陶壶

夏代的刻符与文字

赵春青

目前，在很多学者已经承认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前提下，仍有极少数人以二里头文化没有文字，不愿意承认其是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究竟有没有文字呢？

从《左传》《国语》中，引用了很多《夏书》《夏训》《夏令》的话，说明在夏代已经有了文字。《礼记·名堂位》：“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从考古学材料来看，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就已出土了类似原始文字的符号，仰韶时代的刻画符号更多，尤其是龙山时代丁公遗址出现的连篇文字，不少学者认为已经是真正的文字了。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腹部有两个红色文字，一面可释为“文”字，另一面的符号有人释为“堯”，有人释为“邑”。具体为何字，目前仍存在争议，但大都认为是文字了。据此推断，比陶寺、丁公文字年代还要晚的夏代，应该已经有文字了。

新砦遗址出土有刻画符号或文字的文物。其中，在一个陶圈足盘内，刻有类似汉代五铢钱的“五”字；该圈足盘为大口，尖圆唇，浅弧腹，是龙山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之一。此外，在一个高领罐的肩部刻画一符号，符号像一个或三个文字。除了这两个字之外，新砦遗址还出土一个“五”，不过，这个“五”字是斜刻在一件泥质黑陶壶的肩部。

关于夏代文字，我的朋友、首都师范大学的袁广阔教授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他在文中把二里头遗址见到的“刻画符号”直接称为“夏代的文字”。在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等遗址上也见到有陶文，这些陶文可释读为墉、臣、鱼、井、车等字。另外，他还把个别陶礼器如鬲、爵、尊等，视为夏代文字的取象对象，也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进行甲骨文的创造和运用提供了理论证明。

李维明先生认为，黄寨遗址也出土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字。黄寨遗址距新砦遗址不远，年代属二里头文化晚期，他释读的甲骨是黄寨遗址出土的刻辞卜骨（H1:1）。他的这一说法，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果真如此的话，其意义不可小觑。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学发现，都说明夏代已有文字。

大禹像

编辑 杨　仪
校对 樊迎喜